

1965年“兰亭论辩”惊动毛泽东

1965年6月间,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写了两万字长文《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〈兰亭序〉的真伪》,在《文物》杂志发表,《光明日报》连载。文章提出被称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序》并非王羲之所写!此论一出,立即在学术界引起震动,各大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,展开了一场惊动毛泽东等高层的“兰亭论辩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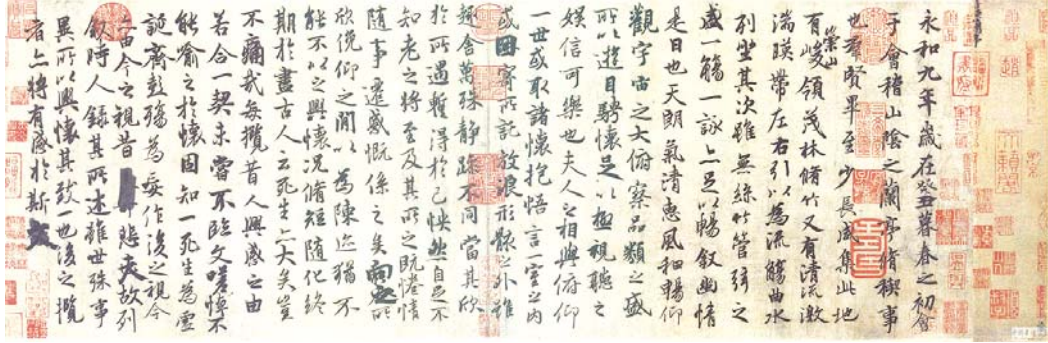
郭沫若的结论石破天惊

“王谢”是指王兴之(王羲之的堂弟)和谢鲲(东晋名相谢安的伯父)。1964年至1965年间,在南京出土了《谢鲲墓志》和《王兴之夫妇墓志》,碑文都是用隶书写成,这与同代的《兰亭序》笔迹大有不同。郭沫若据此认为“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”,而行书《兰亭序》“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,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”。他进一步推论,《兰亭序》的文章和墨迹均是王氏第七代孙——隋代出家禅师智永“所写的稿本”。

这个结论可谓石破天惊!对此,江苏省文史馆馆员、书法家高二适不以为然,写了篇《〈兰亭序〉的真伪驳议》与郭争论。高文引证大量文献和法帖资料,针锋相对地提出:“《兰亭序》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”。

毛泽东拍板展开争论

然而高文写好后,没有哪家报刊敢于刊登。原因在于郭是学术界泰斗,且郭文中又援引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观点为同调,更令人望而生畏。高在一



王羲之兰亭序

筹莫展之时,就把文章寄给中央文史馆馆长、抗战时期重庆诗友章士钊先生。章看后,认为高二适专攻章草,善察笔势,精于鉴赏,故赞同高的观点。随后把高文推荐给毛泽东“评鉴”,以求“得以公表”。两天后,毛泽东给章士钊回复一信。毛泽东在信中表达了希望展开争论的意思。同日,毛泽东给郭发去一信,内云:“笔墨官司,有比无好。”

郭沫若收到毛泽东的信后,当天就约见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,建议在报纸上组织讨论。当时,临时代管文化工作的陈伯达,看到毛泽东给郭的信后立即做出安排。这样,高二适的《〈兰亭序〉的真伪驳议》于1965年7月23日在《光明日报》的“兰亭论辩”栏目见报。

这篇唱“对台戏”的文章推出后,立即引起国内学术界和书法爱好者的极大兴趣。半年内,在《光明日报》《文物》杂志等全国报刊上就发表了数十篇争鸣文章。郭沫若发表了《〈驳议〉的

商讨》和《〈兰亭序〉与老庄思想》等文章。另外,张德钧、启功、龙潜、赵万里、于硕(郭沫若夫人于立群)、史树青等也撰文,坚决支持郭沫若的文章,反对高二适的观点。而支持高二适、反对郭沫若观点的也大有人在,唐风、严北溟、商承祚等许多著名学者在《文汇报》《学术月刊》上发表了許多支持高先生的文章。

康生在背后推波助澜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某些细节:当时,郭沫若除了亲自撰写反驳文章外,还通过他人告诉年轻书法工作者启功:“郭老叫你写一篇文章,响应郭老的观点。”启功便写了《“兰亭”的迷信应该破除》一文,呈郭沫若审阅后发表。

在这次论辩中,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起了很大作用。他亲自提供“王谢”墓志出土拓片和有关史料给郭沫若,作为文章立论依据。郭写完文章后,初稿也要送康生审阅。

康生曾在给郭的复信中夸奖说:“大作《〈驳议〉的商讨》,已读过多遍,写得很好,文章的风格很高,论据充足,很有说服力。这种文章初看似乎是‘心平气和’,而实际上是反驳对方最有力的。”还说:“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,主席问我:‘郭老的《兰亭序》官司怎么样了?能不能打赢?’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。”在“论辩”的整个过程中,康生不只是向郭通报信、面授机宜,还亲自组织反驳高二适的文章。仅在《光明日报》上,康生组织发表的攻击高二适的文章就有10篇之多。

因为没有实物实证出现,“兰亭论辩”持续半年,相持不下。最后郭沫若说:“还是等以后考古发现吧!”1998年8月,东晋名臣高崧墓葬出土的楷书墓志,以实证资料纠正了郭沫若“晋书都必然是隶书”的说法,这桩历史公案才画上句号。

综合《人民政协报》、《书屋》、《学习时报》

●探究

“丝绸之路”的名称是谁“发明”的?

“丝绸之路”这个名称是100多年前一个德国人费迪南·冯·李希霍芬的“发明”,1868年到1872年间,他到中国做了七次“远征”。

李希霍芬去过景德镇,考察完烧瓷的工艺后将景德镇瓷土命名为高岭土;他到过四川著名的都江堰,考察之后盛赞中国古代这个最长寿的水利工程,遂将都江堰第一次详尽介绍给世界;他三涉山西,发现山西地下储煤丰富,以当时世界消耗煤的水平测算的话,他认为仅山西储煤量就可以供给世界几千年的消费。

除了知名普鲁士科学家亚历山大·冯·洪堡之外,可能无人能像李希霍芬一样探究过中国地图上如此之多的空白地带。而中国的祁连山的德文名甚至采用了他的名字——Richtofen—Gebirge(即李希霍芬山脉)。



1873年,李希霍芬回国,先后出任了柏林国际地理学会会长、柏林大学校长、波恩大学地质学教授、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等。他后半生用大部分精力撰写了一部5卷鸿篇巨著:《中国——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》。正是在1877年出版的《中国》第一卷中,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“丝绸之路”的概念,并在地图上进行了标注。这一术语后来被广泛采纳。他还最早提出了中国黄土高原的“风成论”,以及“五台系”和“震旦系”等地层术语。

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,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,繁荣于唐宋时期,在明清时期开始转变,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。作为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,由于该路活动范围主要以南海为中心,而起点主要是广州,所以又称它为南海丝绸之路。

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,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航线,而它的称谓在各个朝代却因运输的物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。比如,在隋唐时期,这条海上通道因为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,大家往往称呼这条东西通道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到了宋元时期,由于出口频繁,瓷器又渐渐成为主要货物,人们就把它叫作“海上陶瓷之路”。后来因为从国外输入的商品主要是香料,又把它称作是“海上香料之路”。

综合《解放日报》、《中国文化报》、《新华网》、《新京报》、《兰州日报》、中新网

英法联军为何不烧紫禁城?

1860年,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,烧毁了圆明园。这件事被当成国耻写进了历史书里。按理来说,紫禁城是皇宫,是大清权力的象征,既然要放火,那么应该在这里放下火才对。联军都打到紫禁城门口了,为什么不顺带烧了紫禁城,却要拐弯绕去烧圆明园呢?

鸦片战争后,中英签订了《南京条约》,十二年后,英国人又跑来要求修约。修约的主要内容,按近代史大家蒋廷黻先生的归纳就是:“公使驻京,内地游行,长江通商,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。”而这几条里,大清最抵制的一条是公使驻京、亲递国书,因为英国人坚决不磕头。清政府要求洋人不仅要磕头,还必须是标准的三跪九叩。其它条款都可以商量,唯独这一条清政府坚持到死也不动摇,并借外务问题交由两广总督处理为由,折腾了英国人好几年。英国人看商讨无效,决定出兵天津,以四百人的伤亡占领了大沽口,清军阵亡两千。

天津守不住了,为防洋人打到北京,清政府派怡亲王到通州跟洋人谈判。谈判未果,英国人要求直接进京。咸丰大怒,命令怡亲王扣拿英国谈判团的团长巴夏礼一群人等,共39人。而就是这个决定直接导致圆明园被烧。咸丰见已擒获了谈判团,就命3万9千名清朝骑兵向通州八

里桥出发,冲向2万5千名英法联军。天真的大清准备趁着英法联军群龙无首,一举击溃敌人。结果却以英法联军5死46伤,清方几乎全军覆没收场。

英法联军接着进了北京,去解救谈判团的39个人。巴夏礼和秘书关在刑部大牢里,其他37人关在圆明园。联军到圆明园将所有人解救完后发现,39人只剩下了19人,有20个已经被整死了,而且有些人的尸体被大卸八块,惨不忍睹。有个幸存者回忆说:被逮的人里面有个叫鲍尔比的《泰晤士报》记者,被抓起来后第四天就被整死了,尸体被扔到野地里喂了野狗。有个安德森中尉,手脚被重度捆绑生了蛆,蛆一直蔓延到全身,精神错乱狂叫三天后死了。还有一个法国人,身上也生了蛆,蛆爬得他嘴巴、耳朵、鼻子里全都是,痛苦而死。

联军见状怒不可遏,总司令额尔金当即表示,必须要给清朝一个惨痛的教训。索性将士兵被虐而死之地圆明园给烧了。当时,法国有个将军叫孟托班确实建议过烧紫禁城,他认为圆明园不设防不算交战区,不烧皇宫清政府记不住这个教训。但额尔金不同意。因为烧皇城,相当于烧北京,北京百姓是无辜的,而圆明园是个私人园林,也是虐待俘虏之地,所以最终烧了圆明园。

据搜狐军事

老上海:商行和当铺串通坑人

上世纪个三四十年代,由于日子难过,人们不得不把物品送往典当铺,靠一点“当金”勉强度日,嗅觉灵敏的商人们很快便嗅出了其中的“商机”:花几个钱,将那些当票收买过来,让此票与物主永远脱离关系,再转手出卖,不就可以大赚一笔了么!于是,一些商家——上有堂堂首饰店、金器铺,下至旧货店、纸烟摊等,甚至连普通住家也纷纷挂出“代客典当”的招牌,据调查统计:整个上海滩,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这类“商行”,竟达5800多家。

有位记者先生,受朋友之托,要买一只手表,于是,便从某“代客典当”处买了一张他们收下的当票,票面上写的是只“双骑马十五钻长方形手表”,当价12块大洋,当票要售10块大洋。经过讨价还价,当票降为8块成交。记者心中暗想,以20块钱买一只价值五六十块钱的手表,还是挺合算的,交款后便拿着当票,兴冲冲地去找票面上标明的那家典当行。

费了好一番周折,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弄堂里找到了那家当铺:弄堂口睡满了乞丐,弄堂里的水泥路面也损坏了不少,所谓“当铺”也是由住家改成,只在紧闭的门上漆了一个黑色的“當”字。叩开大门,记者将当票递给了柜台后面的伙计,只见那伙计将算盘滴滴答答地拨了好一阵,才抬起头来说:“利息3块钱,存

寄费1块钱……”额外交了钱不说,那块长方形的手表,表壳的四周已经生了不少黄锈,表面的玻璃还有条裂纹,表带也旧得几乎快要折断了。记者见表停了,就打开后面的表壳,糟糕的是,表壳一开,里面藏着的零乱的小螺丝、小轮齿、小铜块等,倒翻了一地,只有那断了的发条,像小蛇一样拖在外面,一端还钉在轮齿上,不住地摇晃、抖动。许多小零件都嵌进裂坏的路缝里,再难收拾起来。

倒霉的记者站在路边轻声叹息:理想中漂亮的“双骑马十五钻长方形手表”,只剩下一个生满了黄锈的躯壳——朋友的事情没办成,还损失了不少钱……后来,记者终于了解到:这些出卖当票的“商行”,往往和典当铺串通起来,专门拿坏了的东西、破了的衣服来坑人、骗人;更有甚者,还印了许多假当票,到各处出卖。至于上当受骗者有多少,还真是难以统计。

这个故事出自徐迟等人所著的《上海众生相》,此书民国三十一年(1942年)在上海出版。彼时彼刻,处于沦陷区的上海普罗大众,除了受日寇、汉奸的迫害、欺凌外,还要时时提防随处可见、几乎无孔不入的骗子,其生存之艰难、生活之痛苦,亦可窥一斑。

据《羊城晚报》